习近平给文艺界提六句箴言

72年前，延安，面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高屋建瓴，直指问题核心和实质的重要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72年后的今天，北京，又一场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如期举行，会议的“主角”成了习近平，但会议的任务没有改变：分析、解决文艺发展中的问题。

虽然讲话的全文还未公布，但在新华社3000多字的通稿中，我们依然能读出丰富的信息量，其中习近平给文艺界提出的六句“箴言”，直指当下的不良倾向，尤为值得关注。

1.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沛时期。从产量上说，诸多数据稳居世界第一。然而，繁荣背后不乏隐忧。许多文艺工作者完全以经济效益为创作出发点，身陷拜金主义泥潭无法自拔，满身铜臭味。

为了收视率，电视节目千篇一律，原创能力大大丧失，甚至一些主打猎奇、窥视隐私、以无耻为原料、拿缺点当笑料的节目大行其道。为了票房，卖座与否成为一些导演接片拍片的唯一出发点，烂片大行其道，许多优秀作品“叫好不叫座”。当金钱成为唯一标准，经济效益被无限放大时，艺术便渐行渐远。

鉴于此，习近平特别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要沾满铜臭气。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2.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和《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习总书记在座谈中也提到“为了谁”的问题。“不能在为了谁的问题上产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习近平如此表述。

当下，有些所谓的艺术家，头顶荣誉脚踩光环，却鲜有创作出令老百姓满意的作品。病症就出在没有真正“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即使偶尔人下去了，心还高高在上，对生活的认识也是蜻蜓点水，这样就很难创作出有分量的作品。试想，不知讲给谁听的故事怎会有人喜欢看？脱离生活无理取闹的相声怎会惹人酣畅的笑？

脱离了人民大众，对沸腾的生活视而不见，艺术的光晕自然会变得暗淡，所以习近平在讲话中点醒这些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3.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

“俗”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度的把握。当部分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文艺从业者，把迎合与趋从当成立身的准则，主动放弃这个“度”，就势必会蜕变成低俗。

当下，过度娱乐化充斥荧屏，凶杀、打斗、色情营造的感官生理刺激冲淡乃至取代了文艺的精神美感。身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的图书也未能幸免，内容“害人”，封面“吓人”，标题“雷人”的书籍，居然被摆放在书店的关键架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低俗的作品更是如癌细胞一样滋生扩散。

低俗泛滥，扭曲的价值观被无限放大，人人都是受害者。对此，习近平警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才是艺术最高境界。

4.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习近平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这很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文艺工作中出现了一种竭力回避爱国主义崇高价值的做法。有人甚至标榜“普世价值”，用鄙弃的神情和眼光挖苦贬低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文艺创作；还有人打着各种旗号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鲁迅曾经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精神的状态。不难想象，这种盲目西化、恶搞历史、颠覆经典的不良倾向，会对中国人的爱国信仰、骨气和底气带来什么影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希望习近平这句振聋发聩的箴言能让那些“真正的文艺”的标榜者悬崖勒马。

5.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在全球化时代，一部的好的文学作品，显然既要有时代特色，更要有传统底蕴。

然而，在一些错误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下，当下的文艺工作中，食洋不化、东施效颦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人把西方文艺理论和理念当做圭臬，照搬照拿、囫囵吞枣；还有人在进行文艺创作时，轻贱民族文化和审美传统，以获得西方人认可为最高追求。

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坚持对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但这不是一味复古，更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开放包容心态对西方文艺见好就拿，进行借鉴和化用。如何借鉴和化用？习近平指明了方向：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6.倡导说真话、讲道理

不少文艺界人士指出，文艺创作的繁而不荣、兴而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缺少批评精神，失却批评的鞭策和佑护。还有人一针见血，“文艺批评已经蜕变成文艺表扬”，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友情褒扬”、“红包评论”更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不能对文艺作品说真话，讲道理，让商业利益替代艺术标准，怎么会出精品、出人才？

习近平提出的这句箴言，说真话就是要重新淬炼文艺批评这一利剑，讲道理就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既不让批评失语、缺位，又能驾驭批评方向，褒贬得当而不越界，以此带动文艺作品的繁荣发展。（人民网）

《傈僳族祭天古歌》杀青

●和向东

央视《原声中国》栏目组于2017年12月30日在维西县叶枝镇新洛村开机拍摄纪录片《傈僳族祭天古歌》，2018年1月2日在新洛村耍底组封镜杀青。

传统文化大型纪实纪录片《原声中国》拍摄将历时1年，走访40多个民族聚集地，发现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力量和不同的信仰，在原生态的生活习俗、节日仪式中捕捉即将消逝的敬畏与爱。随着生活的变迁，许多老人和传承人在慢慢消亡，民族源头的文化力量逐渐被人们遗忘。《原声中国》所做的就是找到他们并拍成故事，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美。该片制作完成后将于中央电视台和北京、上海、湖南等电视台播出。

《傈僳族祭天古歌》是傈僳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的一部古歌。祭天古歌包括了《唤祖》、《驱凶神》、《开战打战》、《射日射月》、《寻盐祭盐》、《造日造月》、《洗日洗月》、《迎祭司》、《求雪》、《寻水》、《养狗训狗》、《造纸》、《驯养牲畜》、《炼钉打铁》、《开荒种地》、《药书》、《祈求幸福》等24部。哇忍波是第二十代祭天主持人，他用自己创造的傈僳族音节文字将祭天古歌等记录了下来。现在的祭司是新洛村耍底组的余金全。据余金全介绍，他出生于1947年，7岁时开始学习诵读祭天古歌。目前，他收了几个弟子为徒，农活之余尽传授之责。2018年元旦之夜，他站在耍底组余建华家的房头板屋顶，面对央视镜头，祭天古歌如流水般从他口中“喷涌而出”了将近一个小时(如要全部诵祭完毕则要几天几夜)。同行的维西县民族研究所蜂玉程老师对笔者说：“老余真是了不起，应该是世界级的祭司，世界级的传承人。”

这次探班，方知央视记者的艰辛。他们拍摄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熬了通宵。视事业如生命的敬业精神令我崇敬。天刚放亮，他们和村民们一起扛着照明设备、摄像器材等物，从祭天台下来到没有硬化的村组公路上，然后又顺公路往南走到大约两公里河边停车的地方。临别时，我对制片人司宝君说：“我很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你们今天到丽江坐飞机，只有在飞机上补睡眠了。”他说：“我们摄制组全国各地到处跑，一年在北京的时间也只有1个月左右。”“原生态是没有被刻意雕琢过的，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化形式才是原汁原味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原声中国》。”

这次拍摄，维西县民族研究所负责人全程陪同，做了大量协助工作，蜂玉程老师录制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余尚权先生为了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曾两次自费到新洛耍底组余金全祭司家里摄像录音。

通宵录制。

清晨装箱赶赴丽江。

话剧《西山烟雨》首演

由著名导演顾威、青年导演王翼共同执导的大型舞台剧《西山烟雨》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首演。一段评弹开场，几句简单唱词，配上一曲小调，浓郁的京腔京韵一下子就把观众拉到了那个战乱的时代……导演顾威在采访中表示，《西山烟雨》与其他话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观看这部话剧，跟随演员走进那段历史，能感受消逝在历史中的家国情怀。”

烟雨故事：风雨飘摇的庚子岁月

大幕开启之前，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将观众带回到1900年。在庚子年的硝烟中，话剧的主人公们带着对国家的忧患，悉数登场。

《西山烟雨》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西山一座名叫“临风斋”草堂之内，以著名中医王一珍、文物专家刘文儒、民间文人司马万等为代表的一群民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庚子之乱的战火后避居于此。目睹了“国家蒙难，百姓遭劫”的家国浩劫，他们经历着思想的碰撞、命运的转变，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方法坚守着自己的良心与底线，或不变初衷，或心灰意冷，或无奈妥协。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看似无关，实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烟雨人物：各具特色的多彩形象

主人公王一珍的扮演者是人艺演员尹伟，曾参与过《茶馆》《天下第一楼》等多部经典话剧的演出。尽管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但此次王一珍这个角色，对于尹伟而言仍是一个挑战。剧中，王一珍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而在排练过程中顾威导演一再要求尹伟要压制内心澎湃的情绪。经过反复的磨合与推敲，演员终于体会到角色复杂的情感，独白一气呵成，将王一珍心中无可宣泄的悲苦与迷茫演绎得淋漓精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历经世事，深层内敛的老中医。

此外，话剧中因困顿而最终摧眉折腰的文人司马万、为救国宝而牺牲的文物专家刘文儒、正直傲骨的京剧名家金寿山、胸怀大志却最终堕落的那三公子、战败之后精神错乱的义和拳民田大壮等人物，都凭借着鲜活生动，个性迥异，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观众呈现出一幅悲凉的清末历史人物画卷。

烟雨舞台：水墨绘就的唯美西山

作为一部历史剧，疏阔的舞美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黑白灰色调为主的布景，为整个舞台营造出烟雨意境。舞台中央，一桌两椅，传递着中国传统美术的简约大气。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舞台犹如一幅巨大的泼墨山水，深远苍茫、古朴典雅。人物表演于其中，虚实结合间也成为了画中一景，美轮美奂。

整个演出过程中，都伴随着观众的掌声与感叹。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依然沉浸在戏剧的氛围之中用心回味着剧中所传达的历史深意。导演顾威表示，希望通过话剧中人物的遭遇与行动，艺术地昭示了人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在民间，在每一个爱国的普通人中间，无论遭受怎样的劫难，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会断绝，民族的文明薪火都会世代传续，从而借助历史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人民网）

广场舞也要有禁区意识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明确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类似活动，不得因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之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

广场舞已成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全民健身运动项目之一。然而因为没有规范，导致“高音炮”“放藏獒”“扔老鼠”等极端事件出现。2015年文化部等4部委联合印发通知，提出将广场舞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社会治理层面肯定广场舞的意义。但诸如争夺场地等不良现象又开始出现，比如在郑州洛阳，一群大爷大妈跟小伙子争抢篮球场；在山东青岛，一群老年人占用机动车道暴走；在很多城市，烈士陵园旁跳舞频繁发生。此次《通知》规定的“四个不得”，是在充分认识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制定，也直接指向一个大众关切的疑问：是不是只要体现了利用率，广场舞就应该被容纳？换言之，它的界限在哪里？

很多人认为，广场舞“哪里可以跳”是无解的。首先，《通知》发布以前，没有相关文件明确哪里是“禁区”，也没有哪个部门给出权威结论；二则，“哪里跳”是主观性太强的题目，在广场舞爱好者看来，公园、广场、绿地以及“金角银边”等任何城市空置场所都可以成为场地，唯一注意的是“怎样跳”，比如在篮球场没人打球的时候跳，在机动车道车流量较少的时候跳。这种一味强调“场地利用率”的逻辑，在烈士陵园广场就照行不误。面对管理人员的疑问，不少人辩解“没人的时候，跳跳又何妨”，似乎很难从情理上予以驳斥。但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与纪念烈士无关的活动”，不能跳就是不能跳，这是对烈士的尊重，也体现了对法律的敬畏，托词和辩解一概不能成立。同样，机动车道也是绝对禁区，“挑没车的时间跳”“附近没有其他场地”等都不是正当理由。

考虑到《通知》起大方向的指导作用，更多基层治理还体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比如，如何规定好噪音分贝数，明确好跳舞时间，每个地方的标准可能都不一样。这就要求基层治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不仅要盘活场地存量，而且要牵头组织协调工作，既要听取广场舞人群的声音，也要听取其他利益人群的意见，引导各方合理预期，避免突发事件引起舆论激化。此外，最重要的是引导广场舞爱好者制定自律公约，推动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增进广场舞健身团队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发展。

总之，广场舞并不是无解难题，也并不是总要形成矛盾。从成都人民公园等一些地方的治理经验来看，只要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广场舞健身爱好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望形成规范、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民网）

贾樟柯：我的电影没离开过当下中国

今年，导演贾樟柯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由他任监制，并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导演参与拍摄的金砖五国首部合拍片《时间去哪儿了》在全球上映了。

第二件大事，他在家乡山西举办了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从前贾樟柯有个绰号——“贾科长”。他曾在书中写道，有一天他在北京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淘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正准备离开时，老板突然对他说：“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对他来说，那段故事意味着一个时代。而从1998年的《小武》到2017年的《时间去哪儿了》和平遥国际电影展，20年间的微妙变化，世人看在眼里。

个人跟国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

金砖国家峰会今年在中国举行，贾樟柯担任了金砖五国首部合拍片《时间去哪儿了》的监制。人们很好奇，这篇“命题作文”为什么选他来做？他会怎么做？

“《时间去哪儿了》不是命题作文，是同题作文。”贾樟柯认为，这部电影本身是艺术家们自主独立的创作，主题是5个导演一起头脑风暴出来的，而“时间去哪儿了”最能引发共鸣。至于为什么选择自己，贾樟柯表示，“一方面我自己过去的电影工作比较国际化，容易组织起创作团队，算是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我这几年差不多以两年一部的节奏在拍片，确实还处在创作的活跃期。”

有人说，近年来贾樟柯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但他自己却认为，很多时候创作者个体的目标和整个国家大的目标是一致的。“我20年的电影工作，一直在强调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说明我们个人跟国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再比如文化自信，全社会已形成了共识，这是好事情，“在这个共识之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跟自己的理想是顺应的，而不是违背的。”贾樟柯说，“我的电影没有离开过当下中国”。

中国电影是时候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了

贾樟柯说，自己“一直想办一个以非西方商业电影为主的电影展。现在大家能看到的电影主要还是西方商业电影，在此之外，比如亚洲、南美、东欧等地的电影，观众不太能注意到。但是作为电影工作者，我知道这些地域的电影创作很活跃，成就也很高，几乎是世界电影最有活力的部分。”

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诞生，让贾樟柯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此次电影展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据估算，影展期间的观众有一半是本土观众，有一半是外地来的学生、电影爱好者等，上座率高达93%。“我们一直说中国电影要多样化、电影结构要优化、电影质量要提升，这要依赖的基础除了创作人员之外，更主要是观众。观众开始有多样的观影习惯，开始接触到好莱坞之外的更多元的电影之后，才能形成多样化的观影需求。”贾樟柯说，这种观众基础是创作和市场进步的最大动力。

“过去我们每年只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现在我们的产量大了许多，实际上从产业上来说是做强了，但我觉得产业的影响力应该转变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一部分，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影展中游走，接受着国际的评判。我们一直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非常有公信力、非常专业的平台，中国的观众、中国的影评人、中国的媒体能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在全世界提出中国的观点。我觉得建立这个体系的时机现在成熟了。”贾樟柯说，平遥电影展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电影、也让中国观众更多地了解非西方商业电影的平台，从而促进中国电影创作和观影需求的多样化。

这两年，贾樟柯搬回老家汾阳生活。对40多岁的他来说，事业上、生活上已经到了承前启后的阶段。“从策展上，我就说平遥电影展要注重学术梳理，我们今年做了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回顾展，明年可能会做别的导演。对前辈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精神的梳理、继承，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文化是靠积累的，电影文化有个特点，就是人们求新，但是创新精神也都是从对传统的了解和掌握上来的。”贾樟柯的“启后”，就是多做一些帮助年轻导演的事，“过去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什么资源都没有，什么影响力都没有，也帮助不了别人，现在有些经验有些资源了，能做一些帮助年轻人的事就做一些。”（人民网）

华人家庭文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首播

以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为诉求的新节目《谢谢了，我的家》1月6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首播，以朴实的故事展现华人家庭传承的精神价值。

首期节目中，朱德之孙朱和平、汪曾祺之子汪朗、鲁迅之孙周令飞、边防军人张旭蕾分享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故事。

作为朱德后人，朱和平表示，将继续传承“立德树人、勤俭持家”的家风，这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红色文化内涵。他谈到，爷爷、奶奶虽已离开40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存在自己脑海；如果老一辈能够了解国家和民族取得今天的成绩，相信会感到非常欣慰。

汪朗回忆，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父亲汪曾祺站在阳台上对他喊的“吃饭啦”。汪朗说，父亲汪曾祺面对生活的困难，总能保持乐观。对于家风，他的理解是认真做事、平等待人，不管是对待家人、还是外人，都应该做到这样。

周令飞谈到，爷爷对他生活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背负着“鲁迅孙子”的标签和祖父的名声，周令飞感到如芒在背，父亲周海婴也一度活得很克制，“夹着尾巴做人”。

周令飞希望后代不要背负太大压力，每天都过得开心，同时，永远记住他们的家人——鲁迅。

张旭蕾受父亲、中国红其拉甫边检站第一任站长张玉贵影响，成为一名边防军人。她说，父亲那句“人总是在泪水中成长的，但千万不能被泪水所淹没”成就了今天的她，希望后人也能传承这一坚忍、担当、忍耐、正直的家风。

据悉，《谢谢了，我的家》将通过12期、每期60分钟的节目，讲述54位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华人的家庭故事，展现多样的人生活法、处世哲学和中华气质。

后续节目中，孔子第77代孙孔德墉，美籍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著名主持人倪萍等将分享家庭故事，传承华夏亲情。（人民网）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